

跨国工厂外迁无碍中国制造业进阶



3月27日,在以“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工信部部长金壮龙表示,2022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40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货物贸易出口国际市场份额接近15%。

与传统制造业大国相对应的,是近年一些跨国制造业工厂向低成本国家迁移的情况。业内分析指出,制造业工厂外迁本质上是中国内部产业链自身主动升级换代与外部全球产业链加速优化重组的必然结果,未来我国制造业还需向先进制造业和集群化发展更进一步。

工业全门类和外迁的工厂

我国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有自己的优势。根据金壮龙的介绍,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基本构建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的工业门类,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近年来,出于种种原因,有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印度、越南等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例如,越南从2021年开始就一直在积极吸引国外投资者进入当地建立代工厂。苹果公司已经连续在印度、越南等地建立了好几座苹果

手机的加工厂,富士康、三星、英特尔、阿迪达斯、耐克等在2022年也加大了在这两地的投资,接连建起新工厂。

其中投资力度最大的当属三星。相关数据显示,三星2021年在越南地区投入了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03.21亿元)的资金,将其全球手机接近50%的产能都转移到越南工厂,为越南地区创造了高达65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78.34亿元)的出口贸易总额,实现了7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66.58亿元)的营收。这几乎占了越南全年GDP的近20%。

此外,阿迪达斯、耐克等国际运动品牌也分别将旗下鞋类40%、51%的产能放到越南。业内有观点认为,越南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耐克运动鞋代工厂。三星在越南的投资也大大带动了当地其他产业的发展,据越南海关总署统计,去年一年越南手机及零部件

出口贸易总额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4倍,达到575.4亿美元(约3846.26亿元人民币)。

不是坏事,可能还是好事

对工厂外迁的原因,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最近这些年的确有比较大的企业到了东南亚,客观来看,首先是东南亚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成本比中国相对便宜;其次,东南亚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使得营商环境有了改善;第三,美国对中国搞贸易摩擦、脱钩,造成一些企业转移;最后,是整个东南亚和中国进入了RCEP。

整体来看,吸引企业在各国设置加工厂的原因无非三点,营商环境、关税和劳动力成本。“对各成员国平等开放、红利共享的

RCEP,也使得我国失去了早前独有的关税低的优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陈昌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与此同时,一个蓝领在国内相对发达的城市月薪可能高达8000元/月,但在越南等地可能只有2000元/月。

这些海外企业的产业链转移也引发了不少担心:这是否会动摇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从长远来说,这不是坏事,可能还是好事。”黄奇帆表示,一方面,转移的产品大多数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来料加工类产品,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未见得是坏事。另一方面,产地销、销地产也会带动中国产品到东南亚,中国和东南亚也形成了自由贸易一体化。

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同样表示,制造业工厂外迁只是表象,本质上是中国内部产业链自身主动升级换代与外部全球产业链加速优化重组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节能环保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两高一剩和低端制造业产能都在收缩,一些过剩的高端制造业也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向南亚、东南亚外迁;另外,随着美国近期不断加压对华芯片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链制裁措施,一些对地缘政治和全球产业链高度敏感的境内制造业产业链也加快了海外布局,尽量在战略上实现对冲风险、稳产保供。”

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会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加工厂的转移,先进制造业和产业集群化是我国下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

“中国制造业要往专精特新先进制造业方向发展,传统制造业及其工厂或将逐步淘汰。”延边渤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边渤海机械”)总经理刘超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汽车制造、工程机械制造、农机制造等领域,都面临产能过剩、内卷的问题,还有一些没有核心技术的加工厂进行仿造制造,对好的产品和品牌造成了负面影响。相对而言,专精特新、高端制造业则因其更高的附加值和技术要求,在全球竞争中别具优势。

陈佳则表示,自2022年以来我国逐渐突破了包括14nm SOC先进制程工艺在内的技术封锁。芯片研发设计层面,2023年华为、OPPO都拥有了4nm及以下更先进制程SOC芯片设计能力,生产层面,OPPO自研4nm SOC芯片量产在即,华为2023年全自研14nm SOC芯片也即将上市。正是向加强自主研发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卡脖子难题才得以逐步突破。

产业集群方面,刘超举了他所在企业的例子。“目前外迁的加工厂,大多进行的是一些比较大众化的零件加工作。延边渤海机械暂时并没有在国外建加工厂的打算,一来是工厂需要先进、精密的数控加工设备和专业的技术工人,二来是国内加工厂周边有配套的产业集群可以进行上下游的配套生产,这些要在国外进行并没有那么容易。”

如何做好产业集群?黄奇帆建议,第一,要把产业链集群中的短板补齐,扩链、强链、补链,推动技术进步;第二,要培育自己在当地的一批龙头产业链制造企业或者代工的龙头单位;第三,要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转化出最终产品。

在制造业本身发展方向之外,陈佳表示,外迁与否并非制造业繁荣、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发展制造业产业链所依赖的产业政策、工业基础、人力资源、供应链保障网络、各地综合配套社会保障措施等,才是决定和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吸引力的核心要素。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西街观察 Xijie observation

越是逆风而行,越要扩大开放

陶凤

3月25日-2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在京举行。时隔三年,这一拥有20多年历史的论坛首次恢复线下,也意味着众多的全球工商界领袖将密集访华。

库克现身三里屯苹果店,引来众人围观;辉瑞CEO艾伯乐表示,到2025年,辉瑞将向中国提交至少12项创新药申请,都成为外企拥抱中国市场的生动写照。

这场论坛聚集的高人气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缩影。艾伯乐、库克这些全球化企业的CEO们,在中国感受到的宾至如归的友好气氛,实则来自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

“就我了解,前来参会的各国企业家争先恐后。”前不久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秦刚曾这样“预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筹备情况。

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水乳交融,互为一体。对于全球化企业而言,中国市场是转型和创新的新引擎。

除了积极“引进来”,中国还要更好地“走出去”,让企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抓住两种资源,做大蛋糕、互利共赢。

对于中国人来说,开放的价值不言而喻。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的深刻进程,激发出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中国打开大门欢迎来自世界的建设者和投资人,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已是全社会共识。

高水平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由之路。资本、人才、知识等

生产要素存在历史短板,而通过对内改革提高生产效率,对外开放去争取、整合全球资源,便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国将不断为世界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创造合作机遇,使全球共享中国的发展机会。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强强调,中国的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在举行发展高层论坛之际,一家全球化的中国企业CEO在美的遭遇却是天壤之别。Tik-Tok在大洋彼岸被美国议员围追堵截,这是第一次有来自中国科技公司的CEO面对美国会质询。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逆流,让企业坐立难安,让投资者望而却步。全球刚刚走出新冠疫情的阴霾,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危机和挑战。

经济复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谈何容易。“欲加之罪”“限制出口”“将供应链搬出中国”的论调最终害人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宣示了坚持对外开放国策、全面扩大开放的决心。

封闭的国家没有前途,封闭的市场没有未来。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没有只求自保,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是要保持改革开放的定力和决心。

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于近日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自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到“十四五”时期明确提出要趋势而上支持和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以来,这种就业模式不仅逐渐被认可,也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专家表示,新就业形态在稳定我国总体就业形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未来新就业形态领域将渗透到各行各业,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21%

在数字经济下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正改变着传统的就业形态,不仅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的队伍正在壮大,陪诊师、宠物烘焙师、玩偶修复师等新型职业也已走进大众的视野。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为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到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了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农业户籍人员比例较高。

8400万人的数量意味着什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学院副教授陈建伟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数据规模是非常庞大的,表明新就业形态在稳定我国总体就业形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很多人对新就业形态的提法并不陌生。八年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了“新就业形态”。之后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新经济,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

四年后,为了持续推进新经济新业态发展,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办【2020】32号),其中指出,要充分认识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新型消费的重要意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8400万 新业态从业者显韧性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经济跃迁下,如今的“新业态”和最开始的界定也有了一定的变化。2018年,全总为了推动货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建会入会,曾提出“八大群体”的概念,包括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后来,全总又提出以做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三新”领域职工建会入会,统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重构

近年来,新形态就业者规模迅速扩大。来自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分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参与共享经济的平台从业者人数,在2015-2020年间增加34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9%。

“这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陈建伟分析说,首先,技术进步和平台经济的兴起,进一步加速各类生产要素之间的联结,催生了新的市场需求,拉动了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其次,因为种种原因,有一些劳动者从传统经济中“走”了出来,有转岗和再就业的需求,新业态模式就承接了这部分转移的劳动力的就业。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产业经济中心主任宋向清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增加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人类自由、开放、民主的一种体现。

宋向清认为,这种新的就业形态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新的就业形态是基于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背景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互动实现的虚拟与现实生产体系的结合;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新就业形态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和大众消费升级而出现的一种去雇主化的就业模式,灵活性较高。”

“新形态就业的出现在本质上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引发的生产要素的重构,各类生产要素依托平台进行了新的组合,进而催生出新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是各要素重新结合后一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最优选择,也体现了在技术革命之下,产业链和供应链之间的再造和优化,实现了

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共赢。”宋向清进一步分析称。

引擎

事实上,新就业形态也极大缓解了就业压力。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去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38.6%,居世界第二位;增速同比上升9.7%,位居全球第一,这标志着数字经济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数字经济领域也是新业态从业者优先选择的领域。

陈建伟表示,新形态就业对吸纳就业来说十分重要,避免了经济运行中劳动力资源闲置的问题,有助于促进稳定经济增长。此外,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了生产、流动、交换和消费,降低了交易成本,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

宋向清也持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新业态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体现在缓解了就业市场之间的供需矛盾,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刺激了消费;其次,通过平台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相关领域的市场发展,可以渗透到基础产业的各个层面,从而使服务业和相关制造业都得到更好的发展支撑。

当下,扩内需、促消费是重中之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了首要位置,明确提出要恢复和扩大消费,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其中,就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信心比黄金都重要”,有了工作才有收入,居民才会有消费的意愿。

在3月6日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春临也表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大,就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来自就业和收入,要推动创新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制,使居民有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消费。

“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新形态就业来说,未来其领域会渗透到各个行业,除现在的快递员和网约车之外,还会向教育、养老、婴幼儿护理等与个人日常消费相关的领域延伸,不断发展壮大。”宋向清说。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张晗